

学习

活页文选

XUEXI HUOYE WENXUAN

- ③ 陈曙光 | 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人民日报》
- ⑫ 杨圣敏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国家统一和民族进步
《人民日报》
- ⑳ 金一南 | 军旗为什么这样红
《新湘评论》



中央宣传部主管
《党建》杂志社主办

2017年8月21日出版



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陈曙光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主题是灵魂，是旗帜。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终结了，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并没有结束；大清国倒下了，但中国人民并没有站起来。中国人苦苦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

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才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道路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走出来的。20世纪中叶,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前30年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历史证明,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抛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发展模式、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的伟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单一的分配制度等,但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是社会

主义的中国版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洋火”“洋油”“洋钉”时代到建立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从百姓温饱不足到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足以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气与自信。

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中国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

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中国人民来判断,而不能听信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更不能听信他人忽悠而失去前进的定力。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走得通、走得好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过了几十年的辉煌历程,今后还将继续走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将这5年的成绩概括为9个方面: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坚定不移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了我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所有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在于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完成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何来现代化,何来民族复兴?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提升,但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依然在路上。环顾全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无法绕开的,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对于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发展潜力与发展隐患并存,动力与阻力交错。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我们必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与平稳转型。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度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

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不断释放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但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目前这一制度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1992年,邓小平同志曾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制度成熟、定型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尤其是实现制度成熟、定型,看似长路漫漫,实则迫在眉睫,不容丝毫懈怠。

沿着中国道路胜利前进,就要致力于实现文明复兴与价值观崛起。中西之间的矛盾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价值观之争。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针对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发起“价值观之战”,打造“C型包围圈”和“自由繁荣之弧”,谋求从价值观上围堵和孤立中国。打赢价值观之战,是当代中国必须直面的伟大斗争。中国快速发展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中国的发展优势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话语场,随着国际地位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话语权、制度话语权不断增

强,但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话语权进步还不够快。一个文明塌陷、话语权旁落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物质要丰富,精神也要振奋;硬实力要强大起来,软实力和话语权也要强大起来。中国不仅要站在国家实力的最高处,也要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不仅要成为行动的巨人,也要成为话语的强者。

(选自201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国家统一和民族进步

杨圣敏

当今世界，有多个国家实行不同类型的民族区域自治、半自治或联邦制度。比较而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最成功的。实行这项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较快发展，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各少数民族不仅能够在自治地方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而且能够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并行使相关权力；全国各民族更加团结。实践充分证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

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了数千年来几十个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多元一体传统，汲取了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延续了近代以来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符合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现实条件，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正确选择。

多元一体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它是指统一的国家能够包容多元，多元与统一相互依存。从政治制度看，我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在中央集权之下，允许一些地方不同管理制度的存在。这是我国几千年来能够保持“大一统”，文明绵延不绝、疆域基本稳定、众多民族未曾分散且日益团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集权制度成熟于秦朝，它有助于国家统一。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历代中央政府实行羁縻制度，允许其在地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利。这是因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千差万别，只有承认差异并制定相应的尊重差异的制度，才能维持国家统一。自西汉至清代，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州府和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适应和保持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与此相适应，历代中央政府的法律中均制定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条文。羁縻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既给各民族因地制宜自主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等创造了条件，又促进了各民族互相交流学习并逐渐走向团聚与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了多元一体的政治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制度创新，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维护和促进了国家统一，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历史演进中，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几千年的密切交往中，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特别是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民族实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民族的团结。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下，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从现实条件看，在我国发展历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汉族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主要居住在广大边疆地区，但在内地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也都有分布。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决定了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不同类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同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面积大、资源丰富，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

现实条件决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优势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由此可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飞来峰”，而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有机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统一与自治的有机结合

世界上的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是统一与自治的有机结合，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

统一是第一位的，是自治的前提和基础。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国家统一是各民族人民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保障，没有国家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自秦朝以来，争取和维护国家统一已成为

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核心观念和共同行为准则。统一被公认为是有益于各民族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分裂被公认为是逆潮流而动的。两千年来，我国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统一时间长达1300多年，政权割据、民族纷争时期仅有600多年。即使在政权割据、民族纷争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和民族政权也都主张和争取国家统一。这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必然结果，分裂从来不得人心。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只有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才能充分凝聚中国力量。

自治是为了促进各少数民族繁荣发展。受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相同，每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新中国确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有利于自治地方解决好自身的特殊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统一与自治有机结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处理了国家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各民族把热爱祖国的情感与热爱本民族的情感有机结合起来，使各民族人民在单一制国家里空前团结起来，是统一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又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既维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又维护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利益，对于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着巨大作用，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其他国家有自决权的“地方自治”有着显著不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表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绝对自治，而是在宪法范围内，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的区域自治。

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

我国56个民族在全国各地交错居住，一个自治地方内往往共同生活着数个甚至数十个民族，民族特点和区域特点相互交融。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在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它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纯的区域自治，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能够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创造出多元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情感、道德准则和宗教观念。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更好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让少数民族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是我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集中体现，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最重要的特征。我国不仅从法律和制度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作出专门规定，而且通过设立自治地方，把党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利。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机关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医药等领域制定单行条

例。这充分保障了各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和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较大。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高原、牧区和森林地区，同一区域的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共有的、比较明显的区域特点，而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等方面往往会有所区别。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实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解决民族地区在改革发展中国面临的区域性问题的，制定适应各区域特点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创举，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助、形成“地区合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是对民族问题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是对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模式的发展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又照顾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的特点与差异，实现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为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保障。它有利于把各民族人民凝聚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利于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民族地区改革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必须强调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法强调，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我国各自治地方内都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比如，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人口比重为37%，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为63%，其中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其他10多个世居民族。这些民族分别建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一些自治县、民族乡等。在各个自治州、自治县甚至民族乡中，也都是多民族生活在一起。除了新疆，其他民族自治区也都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正确处理聚居民族与散居民族之间的关系，充分关照区域内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使每个民族都能平等享受发展机会。那种想在自治地方内实行某个单一民族独享自治的主张，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是有害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也是我们一贯坚决反对

的。同时，民族区域自治也不能超出域界之外，某个区域内的民族自治条例并不能在区域外实行。因为这既违背现实，也不符合宪法，更有害民族团结。特别是那种要建立所谓的跨区域的“大藏区”主张，完全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损害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主张，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选自201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

军旗为什么这样红

金一南

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崇尚过各种思想、主义,但最后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

我们有过多次尝试,但是屡屡失败。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维新,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时社会主义是边缘性的思想,没有人信服它,梁启超认为搞不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孙中山也认为搞不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政府的条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同意这个看法。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当时中国社会300多个政治团体又多了一个党派而已。当时的中国,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都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党能持续多长时间。

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命运的幸运儿。这些当年参加建党的人,有谁知道这个党28年后会夺取全国政权呀?所以党刚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

这个党的发展是何其艰难。

艰苦奋斗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伟的毛泽东。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当人们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论在推断革命发生不发生、成功不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寻找革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在白色政权包围之内,可以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直接的原因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拥护,而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西苏区,都是在各个白色政权接合处。红军长征时,我们又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搞工农武装夺取政权,而在德国搞不成?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在日本根本没这可能?关键就是中国的白色政权四分五裂。所以毛泽东后来讲,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病体,毛

泽东把住了这个病体的脉象。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有病乱投医的话,毛泽东则开出了一个管用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不把中国社会认识透,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毛泽东从来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党的上一届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毛泽东曾经讲,真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不是神,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不犯错误,而是他的思维极富历史自觉。什么是历史自觉呢?第一,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深刻理解。第二,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一辈子不甘心被命运左右,一辈子都在主动营造,这是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第二,德高望重的朱德。朱德同志原来在滇军当兵,已经当上主将了,却一门心思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历史自觉在推动他,让他一定要干一点大事。

他到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把朱德当军阀,婉拒了他。朱德在国内入不了党,就从上海跑到巴黎,想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法国,才知道巴黎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去了德国。于是又追到德国。朱德同志为了入党,从上海跑到巴黎,又从巴黎跑到德国,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起义时，朱德地位很低，所带兵力只有一个营，大约500人，而且年龄偏大。起义部队南下，这500人几乎跑光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后来陈毅讲，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一个老同志罢了。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朱老总就扮演一个打杂的角色，不是开路，就是殿后。五六天后，朱德带领部队完成阻击任务，把部队收拢了，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可是，这时南下的主力军全军覆没了，领导人也分散了，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叶挺去了南洋。一瞬间，整个南昌起义部队只剩三河坝留守的那2000多人。当时大家说散了吧，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朱德。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朱德说他有办法，于是大家就勉强跟着他了。

八一南昌起义时，士兵们都穿着短衣短裤，跟着朱德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裤，而且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于是队伍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800人了，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朱德没有动摇，他在整编大会上坚定地说，大革命虽然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

后来据留下来的同志回忆说，我们当时站在下面，谁

都不知道俄国人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从朱德这种充满激情的信心中,感觉到了信仰的力量。陈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众情绪低到零点,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给大家以信心,这就是总司令的伟大。这800人谁能够想到二十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威风呢?但是每一个自愿留下的人,从朱德身上都感觉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还有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这800人的队伍里面。这800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这是朱德的重大贡献,朱德从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人。

第三,全党的典范周恩来。周恩来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党内力量凝聚起来。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他可是低估了蒋介石剿灭江西红军的决心。这封信交给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他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

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极为重大的贡献。

长征途中周恩来与博古也曾有一次重要谈话。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要让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第二天一早,博古把全部权力交到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艰辛而残酷的革命历程

人必须要有理想,没理想的人走不远,没有理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为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党曾经在1927年和1934年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世界政党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领袖集团一层层被强大的敌人清除

掉,再换一批,再被清除掉,然后再换一批,一直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这种情况真是前所未有。当然,其中也有因为大革命失败而牺牲或是叛变的。

革命遭受失败是残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了,这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职务的叛徒。1934年红军长征时,高级领导干部叛徒比比皆是。革命就是大浪淘沙,中国革命风太高、浪太急,能坚持到底实在不容易。

毛泽东当年很难判断中央红军剩下的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当地红军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

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遇到了多少急流险滩呀!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徐海东同志褒奖有加。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纵观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一方面历史给中国共产党的磨难超过给所有其他政治团体的磨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烈士有370万。这就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而中国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原因。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第一,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我们当年为什么取得成功?我们的力量根源到底在哪里?刘少奇同志曾讲,我们共产党什么都不怕。美帝国主义我们不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我们不怕。但是共产党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在半空中被敌人勒死。今天,我们的党就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被别人抱起来,或者我们一定不要自己把自己抱

起来,脱离跟大地母亲的联系。

第二,培养健康的精神氛围。有很多国家的青年,正在重走长征路,因为今天的长征路线已经完全超越了国共内战,超越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人类不屈精神的象征。这条道路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可是我们自己却有人在批判它、贬低它。我们现在一定要明确,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英雄主义的熏陶,民族精神的养育,历史文化的传承,都是必须的。

我们今天正处在发展的关键点,我们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从1840到2050年,中华民族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牺牲奋斗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认识这些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件,才能使我们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民族的凝聚力是那么多中国人牺牲奋斗而得来的,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把它丢掉,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2017年第15期《新湘评论》)



← 微信扫一扫,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